

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

明 朗

1962年1月11日“七千人大会”在北京召开。规定各省由省(市)地(市)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。我当时被下放到四川省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,因而也参加了会议。四川参加会议的人住前门饭店,我和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同志住一个房间。大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,总结“大跃进”以来的经验教训。报告提到“权力下放过多,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发展。”“从全国讲恐怕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;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,也可能是七个指头。”讨论报告时,采用大小组会结合的办法。小组会以地(市)为单位,地(市)委书记是当然的组长;大组会以省为单位。万县小组讨论时,多是联系本地实际,阐述对报告的体会。有人发言也涉及到省里工作的看法,说:四川恐怕属于倒三七哟!

有人甚至说恐怕十个指头都烂了。燕汉民立即制止道:“全省的情况咱们不了解,不要乱估计。”会后,我对燕汉民说:“到中央来开会,你制止县委书记们发言,可不大对哟!”燕汉民说:“你在省里工作,还能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脾气,任他们这样瞎估计,要是传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耳朵里,那还了得。我们到省里开会,都准备了两本账,看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口气,该掏哪本掏哪本。对省的工作的评估,还是听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说,咱们就怎么跟。”

开第一次大组会,省委主要负责人说了几句,大意是:先体会报告精神,不要急于联系实际。开了几天,该联系实际了,又说:各人检查各人的,不要上推下卸。于是,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。省委主要负责人大概觉得老是没有发言不大好,

便拿出在省里开会惯用的办法,指定人发言。被指定的人不得不联系本地区情况,讲一番自己的经验教训。

我于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下放到德阳县任书记,亲身体会到省委主要负责人那些“左”得出奇的瞎指挥,特别是收回毛主席的“党内通讯”,不许贯彻执行的行为,十分恶劣。1959年下半年我率川剧团出国,躲过了反右倾的灾难。回国后,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把许多反映真



刘少奇、陈云、邓小平等在七千人大会上

实情况和对他有意见的地厅级干部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,(下边层层如法炮制,人数就更多了)1961年我又被下放到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,目睹农村的惨状,到处是浮肿病人,到处是新坟累累,家毁人亡,心中十分难过。只能和几个信得过的同志私下议论。如今到中央来开会,还是这个情景,人人噤若寒蝉。我气愤不过,于是决心向中央写信,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。写的时候勇气十足;写成之后,寄与不寄却犹豫不决:很怕这封信万一转到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上,后果就严重了。犹豫再三,便去找弟弟明吉顺商量。(他是1938年到延安的,这时在中央劳动部工作)弟弟很支持我,但不主张用真实姓名,而且信由他代抄代寄,以免被人查笔迹查指纹。于是,就这样办了。原信如下:

毛主席、刘主席、周总理、朱总司令并党中央:

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,第一次到中央来参加会议(中央工作会议)。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,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,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。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,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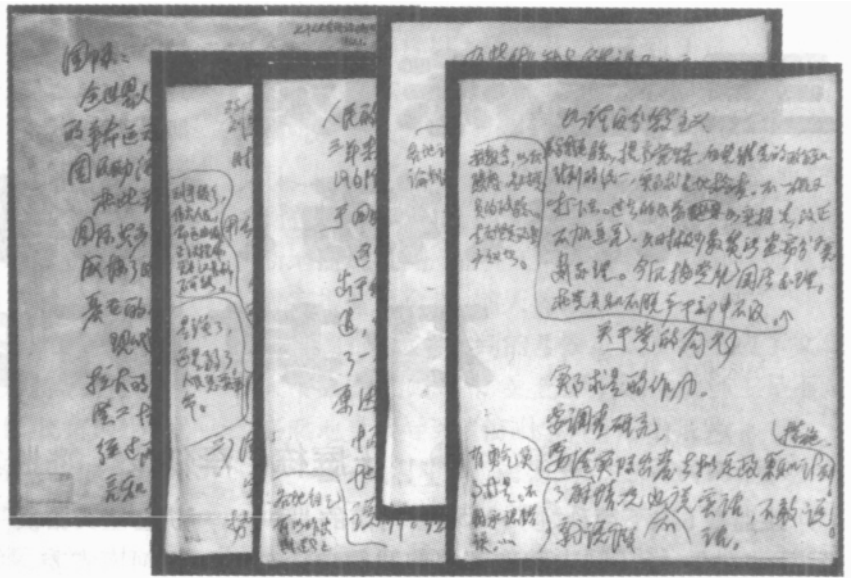
中央提倡说实话,所以我想写这封信,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给中央。

这次开会,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,不联系实际,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,但又叫各人检查各人的,不要把责任往上推、往下推。这几天有人向省委提了点意见,又说发言要端正,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,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。

不许讲话,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,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,这不过是省委主要负责人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。

在四川工作的干部,上上下下不敢讲话,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,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:

一、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,四川省委不准传达,不准贯彻,叫下边从积极方面了解。



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提纲

二、毛主席反“左”的八句话,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,变成反右。

三、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,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。

四、四川自作聪明提出“一个样”、“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”等政治口号,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。

五、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,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,是划自留地、解散食堂、毛猪下放。甄别的结果“批判基本上正确”,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错误;邓自力也没有复职,对其他人的处分,当然也都是“基本正确”。

六、四川省前几年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是八两,不久以前规定四两、五两、六两(十六两秤),有的执行下来,农民一人一天只能吃二两、三两,现在还在饿死人。

七、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,没有发到县,不许县里试点,现在中央作了决定,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。

八、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,四川省委改成“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,进行社会主义教育”,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,千分之几斗争打击,百分之几批判,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,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,哪个交不出不准来北京开会。

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搞分散主义,结果是怎样呢?结果大量死人、死猪、减产,(下转15页)

所处现实环境不满罢了。如果说,把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情况,或者说把1949年到1952年那短短三年间的情况,叫做实行了新民主主义,其实也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,不用说回不去,就是能回去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倒退决不是出路,出路在与时俱进,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、法治的、富裕的现代化国家。这些前面我已经说过了,这就是我的看法。

笑蜀:这样一个真正民主的、法治的、富裕的现代化国家,你认为中国有希望达到吗?什么时候能达到?

李锐: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,这是个

(上接17页)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,不少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,四川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,还要饿死多少人,谁也不知道。像这样严重的问题,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敢叫下面讲话呢?

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,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。

一个四川干部

一九六二年一月

(此信中共中央办公厅是1962年1月25日收到的)

信发出后,隔了不多几天,毛主席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,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;有些话就像是针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。人们私下议论,这一回要是能把省委主要负责人撤了,或者调离四川,那就好了。主席讲话后召开的四川大组会,竟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,这真是出人意料破天荒的大事。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时,对他的错误虽然是轻描淡写,但也流了眼泪。主持会议的是邓小平,邓最后说了几句,话不多,却让大家清清楚楚感觉到保护过关的意思。

第二天的大组会,省委主要负责人未到会,由李大章主持,说是听取对省委主要负责人检查的意见,中央机关还派了两个人来记录。可是,没有人发言。李大章启发了几次,仍旧静悄悄的,大约有一个钟头之多,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同志才站起来讲话。他只字不提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,却自己检查起来,说自己的工作没作好,连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,非常痛心,觉得对不起

很好的提法,并且定义为六个目标,民主、法治列在首位,既符合全国人心,又顺应世界潮流。因此民间立即传出“拆”字之说:民以食为天,有“禾”入“口”;民主首靠言论自由,人“皆”能“言”。如果按照过去斯大林的理论,这个提法必定会被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,今天谁还在乎这顶帽子呢?这就是历史的进步。只要经济上不出现大问题,政治改革,社会转型慢慢来,就有希望。中国的事着急没用。一代人跟一代人总会不同,而且大环境在变化,整个世界形势在变化。所以总起来看我并不悲观,还是比较乐观的。

(责任编辑 杜晋)

省委,以致也流了眼泪。他这样一带头,便有人跟着检查起来。后几天的大组会竟成了为省委主要负责人鸣冤屈、表同情、献忠心的大合唱。我注意到几个资历较深的地委书记如李林枝等同志始终未发言。

大会结束前,省委主要负责人召集了一次小组长汇报会,燕汉民告诉我,省委主要负责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犯错误。(可能是犯了错误,大家仍应团结的意思)并且询问各小组里有哪些人情绪不正常。(指对省委不满意)我却想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检查内容怎么只限于那封匿名信的范围,莫非这封信真的转到了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中,心里一直忐忑不安。

到了“文革”时期,李大章揭发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,曾提到七千人大会有一封信;中央当时就印发给各常委。红卫兵竟然到中央机关去把这封信抄了出来,刷大字报到处张贴。我当时被关押在川大学生宿舍,今天被这个单位拉出去挂黑牌子游街,明天被另一个单位揪出去坐喷气式批斗。造反组织那时到处查问匿名信是谁写的?问到我头上,我见省委主要负责人已被打倒,(中央报刊已把他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)便承认是我写的。想不到一夜之间,我便从“省委主要负责人”的“黑干将”、“文教新帅”、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变成了响当当的“革命干部”,免却许多皮肉之苦。不料“文革”后期省委主要负责人复出,我又遭到他的打击报复,应了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”的古训。

(责任编辑 杜晋)